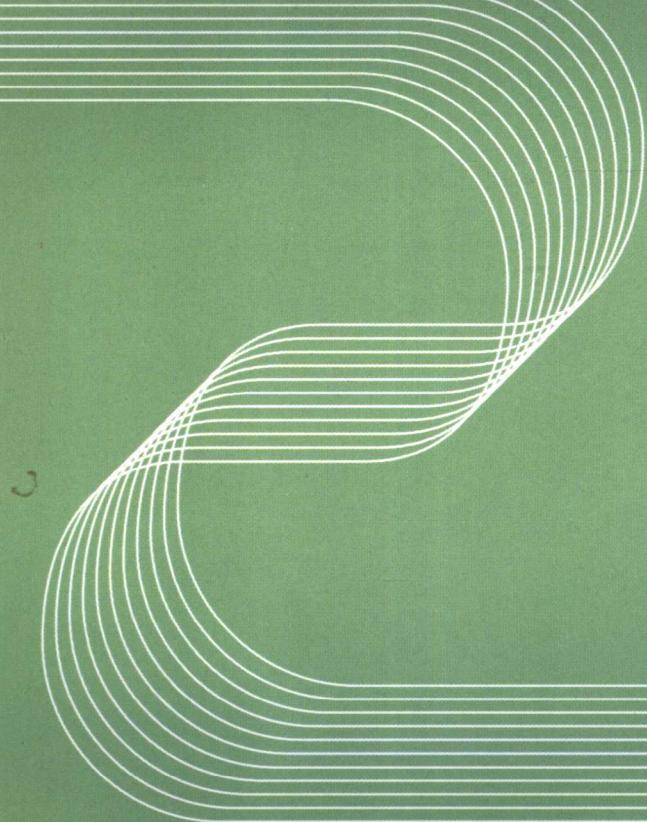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 区域发展

林凌 著

ZHONGGUO JINGJI DE QUYU FAZHAN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林凌著

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

李国平 刘春华 王海英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林凌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10

ISBN 7-220-07264-3

I. 中... II. 林... III. 经济发展:区域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06 号

ZHONGGUO JINGJI DE QUYU 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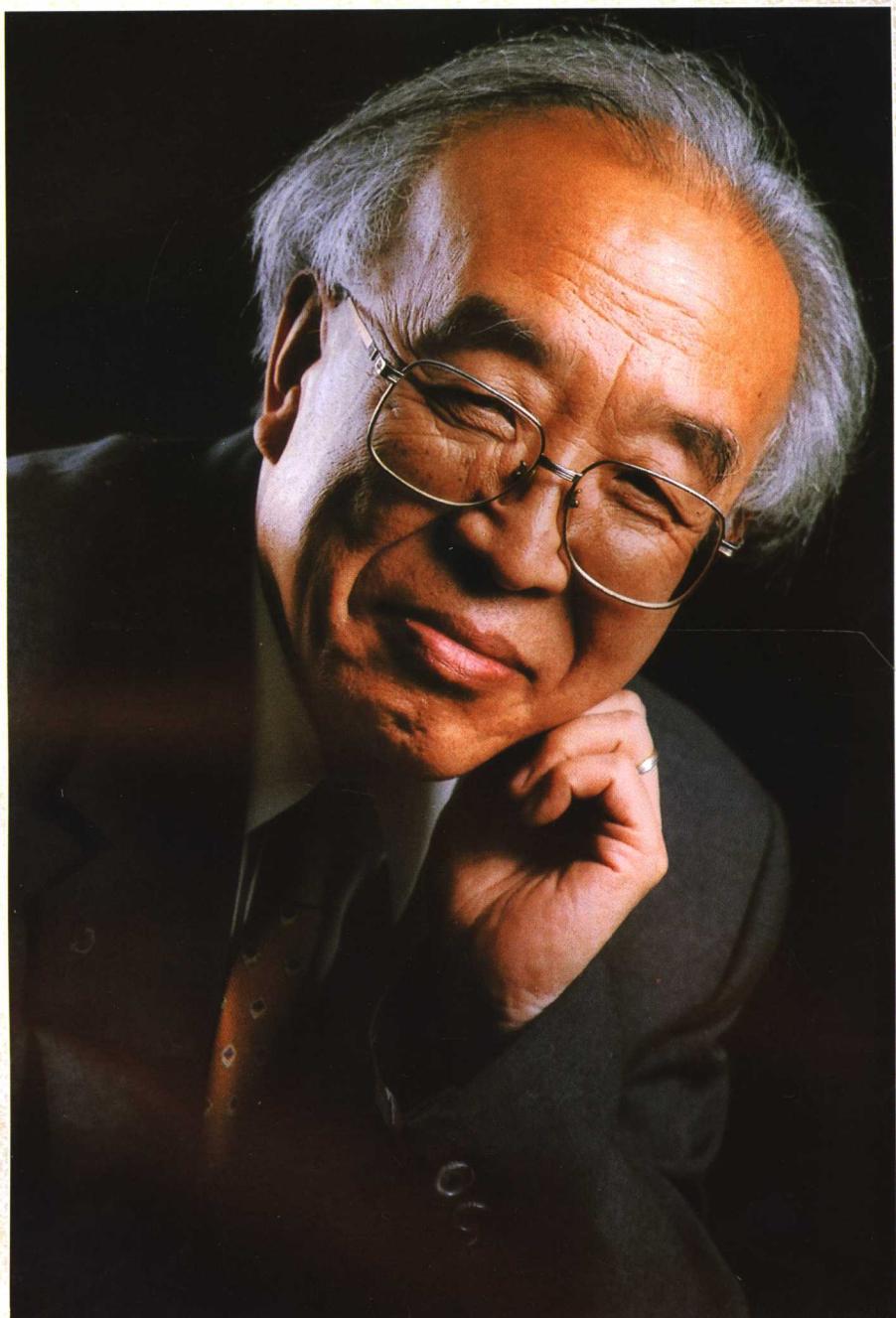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

林凌 著

责任编辑	何朝霞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杨潮
责任校对	叶勇
责任印制	丁青 李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com E-mail: scrmcb@sc.cnc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55.5
插 页 数	4
版 次	878 千字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ISBN 7-220-07264-3/F · 780 8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作者近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区域发展述评

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及改革对策 (21)

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若干问题 (44)

再论我国战略布局中的东西部结合问题 (57)

中国内陆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策 (65)

重视区域经济研究 (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布局调整

——学习“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区域发展”的体会 (79)

关于经济结构调整 (88)

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 (104)

论中国农民的造城运动 (109)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 (114)

第二篇 东部率先发展

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 (123)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尽快建设 (170)

环渤海经济区：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增长中心 (174)

关于在南沙辟建自由港的研究报告 (184)

■ 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

深圳的工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231)

第三篇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中国老工业基地振兴之路 (241)

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若干问题的思考 (267)

向国际自由港区的目标迈进

——关于在大连构筑“北方香港”的研究报告 (275)

第四篇 西部大开发

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讨论 (281)

城市：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依托 (301)

以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推进西部大开发 (310)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挑战 (316)

审视西部大开发 (323)

开发性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340)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 (347)

努力开辟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渠道 (352)

正确评价“三线建设” (356)

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 (360)

内蒙古中部经济区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 (369)

走生态经济之路

——对广元发展思路的建议 (380)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几个问题 (386)

高度关注“十一五”时期四川甘孜州的协调发展 (399)

第五篇 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 (405)

把武汉建成东西南北的交汇点和枢纽站 (417)

中部平原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探讨

——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关于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战略若干问题的决定	(426)
河南莲花集团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验与面临的课题	(439)
关于莲花集团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工作情况报告	(444)
挑战贫困，做好“农”字文章 ——河南省科迪公司的创业道路及启示	(448)

第六篇 成渝经济区建设

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面向未来的七大策略与行动计划	(465)
川渝合作共建长江上游经济带	
——川渝合作框架的初步构想	(514)
极富开发潜力的长江上游经济带	(572)
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	(578)
进一步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	(591)
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构想与设计	(613)
增强成都的经济中心功能	(672)
工业化与区域发展 ——四川工业强省战略若干问题研究	(681)

第七篇 中国版图内的经济协作及“10+1”区域合作

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与中国经济之发展	(731)
进一步推进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协作	(745)
在反金融危机中加强两岸经济协作	(761)
中国与经济全球化	(768)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	(777)
对两岸交流的期盼	(782)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海峡两岸及多国的经济合作	(785)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中国奇迹”	(807)

■ 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

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台湾经济的未来.....	(812)
CEPA 与华南经济圈.....	(829)
泛珠三角与四川.....	(841)
从珠三角到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	(845)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大开放.....	(85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深圳发展.....	(854)
台商大陆投资面临的新机遇.....	(859)
从“东南亚联盟”到“亚洲联盟”之路.....	(864)
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 ——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	(870)

前 言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改革开放开始的。在改革理论、企业改革、城市改革、政府改革、宏观改革等方面都注入过相当的精力。与此同时，由于在东南西北区域间进行调查研究，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写下了一批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著作。

本书是由我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著作集成的。最早写于1985年，最晚写在2005年。全书共七篇：第一篇为“区域发展述评”，第二篇为“东部率先发展”，第三篇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第四篇为“西部大开发”，第五篇为“中部崛起”，第六篇为“成渝经济区建设”，第七篇为“中国版图内的经济协作及10+1区域合作”。在整理这些著作时，我欣慰地发现，我的写作思路与中央近几年提出的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促进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而是说我的研究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

(一)

东西部关系一直是我研究区域经济的主线。建国以来我长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等领导机关工作，熟悉西部。20世纪60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时，《论十大关系》中“沿海与内地关系”的论述给了我很大发，使我对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0年至70年代，我参加了建设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三线建设”，对西部的发展更建立起

难舍难分的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初中央提出沿海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全国掀起了东西部关系的大讨论，我也深深介入其中。1985 年我的论文《再论我国战略布局中的东西部结合问题》在《人民日报》和 CHINA DAILY 上相继发表。对当时流行的“东部重点论”、从东到西的“梯度推移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力主实行“东西部结合论”。而这时，东部沿海的 5 个经济特区和 14 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已全面启动，“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等现象已在西部广泛出现。西部省份在呼吁“一线三线结合”、“东西部对话”的同时，不得不采取“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等策略到沿海地区投资开店设厂，寻找新的发展出路。这时，我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了一个由区域均衡发展论者到区域非均衡发展论者的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应马洪（原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和李灏（原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之邀到深圳筹建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担任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不但接触了东部，而且有机会深入学习邓小平关于“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政策。我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对西部地区的了解，深深感到，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家底很薄，如果在发展中没有重点，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撒了胡椒面，必然一事无成。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应当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那么，重点应该选在哪里呢？邓小平高瞻远瞩地看到，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明显迹象，东亚地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七国）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如此集中的高速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这种罕见的国际经济现象告诉人们，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特别是向东亚地区转移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加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行列，而首先能够接受国际市场辐射和走向国际市场的是我国与东亚接壤的东南沿海地区。由此，我国东部尤其是东南部就成为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地区。

1994年我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撰写一篇《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研究报告。我和刘世庆等同志先后在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七省市作了调查研究，这些地区的景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们在考察和研究中发现，仅仅16年的时间，东南沿海就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剧烈变动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发展了高度的外向型经济，走出了双轨推进的城市化道路。我们第一次用钱纳里、库兹涅茨、罗斯托等经济学家的经典工业化理论，分析了东南沿海七省市的条件数据，欣喜地得出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在工业化中起飞的结论。我们进一步分析，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的GDP由3624亿元增加到45006亿元，增长11.41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在45006亿中，东南沿海的贡献达18825亿元，占全国的41.8%。我们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东南沿海地区40%以上的直接贡献和所起的带动作用，中国的GDP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的。这充分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

对于使东南沿海实现经济起飞的因素，我们也作了深入的分析。一是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二是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三是历史文化因素，四是政策因素，五是特区因素。这五个因素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是我们选择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们的报告于1995年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后将书名改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于1997年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再次付梓之际，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上对“东亚奇迹”、“亚洲模式”、“亚洲价值观”的质疑之声又一次泛起。有人断言，东亚、东南亚已经失去了发展动力，从此将凋敝下去。我是不同意这些看法的，为此，我为本书写了一篇后记。我在后记中说：“东亚奇迹”是包括“中国奇迹”在内的奇迹。对“东亚奇迹”等作出将凋敝下去的结论为时尚早。人们倒是应当通过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对“东亚奇迹”产生的深刻根源，对“亚洲模式”的特点和缺陷，对“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内涵和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世界经济重心是否在向亚洲转移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所有成功国家的经济都是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济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切

成功的模式，包括“亚洲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经常改进和完善的，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好的模式也会导致失败。今天看起来，我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

(二)

由于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东南沿海各省内部、新兴工业地区和老工业地区、东西部之间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引起了国内人士的关注，也引起了外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评论。记得一位国家的总理访问我国时，就直接向我国的总理提出如何面对东西部出现的差距。

我对差距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96年。当年5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加快西部改革开放研讨会”的发言《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及其改革对策》中，用详尽的数据罗列了差距的表现，分析了形成差距的原因，阐述了我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我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扩大，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而且国土面积越大，地区发展越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时间持续越长。国际经验表明，地区差距从扩大到缩小，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扩大阶段，二是稳定阶段，三是缩小阶段。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从扩大到稳定到缩小，大体都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而且缩小之后，由于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往往使传统产业集中的地区衰落下去，新兴产业集中的地区发展起来，从而又出现新的地区差距。从上述情况看出，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又到不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主要是三个因素或者三种力量：一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二是市场的作用，三是政府的政策。这三个因素或者三种力量在各个国家的作用范围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但不论何种制度的国家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或三种力量。中国更不能例外。

我还认为，这种差距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带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可以尽快增大全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二是可以造成经济落差，形成经济势能，带动发展较慢的地区前进；三是可以让被封闭和沉

淀的生产力流动起来，流向发展条件较好和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使要素在流动中生财；四是可以形成商品优势，实现区域互补。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差距的扩大不能是无限度的，必须在国力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后进地区的发展。所谓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我给它的定义是：非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但在推行中必须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不断缩小拉大着的差距。

(三)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后进地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随马洪同志到东北进行考察。东北是我国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最为著名。但由于技术装备落后、资源枯竭、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深、改革开放程度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现象。而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东南沿海新兴工业基地，无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的外向度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特别是这些地区的新型日用消费品工业发展很快，他们一方面出口国际市场，一方面用市场经济方式向北方和西部进军，很快占领了全国的市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广东的产品已形成领导全国消费品新潮流之势，连上海都难以与之抗衡。这一时期，上海、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老工业基地也纷纷引进设备和技术，生产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以后又生产 VCD，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城市的家用电器产品，不但竞争不过“三资企业”，也竞争不过像广东科龙电冰箱、江苏新科 VCD 那样的乡镇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其他国家建设需要的大型成套设备，老工业基地也生产不了，必须进口；已引进的也不能消化吸收，还需要重复引进。这些现象说明，我国老工业基地在技术和产业方面，老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与国际差距越来越大，不能再拖下去了。鉴于这种情况，马洪同志向中央写了《拯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报告。之后，又开展了“东北现象”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我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原名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的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 年，我和学术委员会的同志决定进行一

次全国性的老工业基地问题调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振兴老工业基地研讨会，向中央提出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和荣剑英、刘世庆等同志先后调查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西安、成都、大连、哈尔滨、长春、本溪、兰州、太原、洛阳等全国 14 个综合性老工业城市（未包括资源性城市），由我和刘世庆同志执笔写出了一个《中国老工业基地振兴之路》的报告。2000 年 3 月 27 日“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研讨会”在沈阳召开，我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会后修改上报给国务院和朱镕基总理，同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写了报告，建议把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范围由原来界定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哈尔滨 6 个城市扩大到 14 个城市。

在报告中，我首先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对我国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作了阐述。

我认为，老工业基地是一个国家历史形成的工业力量和社会财富的巨大聚集地。从国际和历史角度看，所有老工业基地都经历过一个从开发期、鼎盛期、衰退期到振兴期的演变过程。演变是由科技进步、市场变化、资源枯竭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进入衰落期后，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已转化为新兴产业为主的工业基地；有些资源型开采基地，因资源枯竭，已经衰落，但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被破坏的地貌、植被、生态环境等得到恢复，产业得到更新，重新繁荣起来。我国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经过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如果以三线建设为界，可称为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大约有 14 个之多。此外，还有数十个老资源开发性城市。其中，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这个基地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正如世界上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规律那样，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有一个开发、鼎盛、衰落、振兴的过程。在长达数十年至上百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的统治下，在 30 年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和半封闭的制约下，老工业基地技术、装备陈旧，产业产品落后，体制和机制不活，法律和政策保障缺失，与国际水平形成强烈的反差，许多老工业基地已开始衰退。

我认为，我国老工业基地衰退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

是由技术、装备、产业落后引起的，二是由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前者，与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的情况基本相同，后者，则是我国特有的。因此，振兴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必须从两个方面作战，一方面通过改革来实现体制转型，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把老工业基地城市建成区域经济中心；另一方面，以创新精神进行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

关于两个方面作战，我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在体制转型方面，我认为，老工业基地必须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所有制结构调整，三是三次产业结构体系的建立，四是老工业基地城市功能的转变。后两个改革对我国老工业基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二、三次产业的概念刚刚引进我国，新的统计和核算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老工业基地的第三产业十分薄弱，而工业化要在三次产业互动和协调发展中才能实现。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基本上是工业基地，而不是区域经济中心；在改革中，城市功能必须向生产中心、流通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等区域经济中心功能转变。

在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老工业基地必须实行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三者并举的方针。三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振兴老工业基地，国家必须要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在报告中向国务院提出了5条建议：(1) 把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并列入国家的“十五计划”和长远规划；(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对老工业基地实行补偿倾斜政策；(3) 对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给以有效的倾斜政策；(4) 发挥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解决军工企业的困难；(5) 进一步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现在中央已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列为国家区域战略之一，奋力推进，令人十分高兴。

(四)

正在我紧锣密鼓地研究振兴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于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发表重要讲话，下达了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动员令。这个讲话令我十分振奋。我满怀激情地感到，继“一五”、“二五”、三线建设之后，第三次西部大开发就要开始了。我的研究立即向这个方向转变。

关于开发西部，是中国的大局，是西部人早就期盼着的事情。邓小平在作出沿海发展战略决定时就说过：“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西部大开发，说明实施战略转变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我认为，时机和条件成熟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发，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展和富裕起来，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2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6倍，1999年达到9893亿美元，其中，东部的贡献率达63%，国家已有能力进行西部开发。二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20年间，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之间出现很大差距。1999年，全国人均GDP为786美元，东部为1211美元，西部为507美元。西部比全国平均低64%，比东部低1.39倍。而1980年，西部比全国低30%，比东部低1.05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这种差距的拉大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社会、民族、宗教、边疆等众多问题。

2000年10月我参加了国务院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中国西部论坛”，发表了与刘世庆同志合写的论文：《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讨论》。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着重探讨了西部大开发的模式。我们认为，这次西部大开发是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体制背景不但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与邓小平讲“两个大局”时也有很大不同。国家已不可能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以国家财政投资方式进行建设。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是一个重要方法，但国家财政力量有限，不会有大的投入。是不是可以采取抑制东部发展的方针来开发西部？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东部看，都是不适宜的，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东部经济总量已在全国举足轻重，东部发展慢下来以至停滞，将对全国造成严重影响，对支持西部的开发也很不利。

而且东部已经积累起相当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对外扩张能力，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想限制它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像 20 世纪 60 年代那样强制搬迁和平调东部资产、资金、人力更是行不通的。因此，开发西部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式。这个新的思路和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那种东部西部轮番开发转变为东西部联动协调发展；二是从主要依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财政拨款开发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吸引多种资本开发。1998 年开始，国家实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方针，为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来源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

西部是一个国土面积占全国 71.5%、人口占全国 28% 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低的区域。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国家全局来看，是朝着东西部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但具体到西部内部，则必须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方针，有重点地推进，一旦撒了胡椒面，其后果比任何地方都严重。为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强烈呼吁，要以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推进西部大开发。这里协调发展是指东西部之间，非均衡发展是指西部地区内部。我指出，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重大支撑力量，主要是实行了对外开放和非均衡发展两大战略。在整个东部，并非全面开花，而是先从广东、福建开始，而广东、福建又是先从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开始，之后才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形成由点到线的格局。到 1992 年以开发上海浦东为标志，沿海各省市自治的开发和对外开放才由线到面全方位展开。在每个省市的开发开放上，也实行的是重点推进战略。广东的重点是珠三角，江苏的重点是苏南地区苏锡常，浙江的重点是杭嘉湖和温州，山东的重点是胶东半岛，福建的重点是厦泉漳三角区，上海的重点是浦东。如果当时没有实行这些重点推进战略，就没有今天东部各省市的全面飞跃发展。

西部大开发初期，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曾经规划了长江上游经济带、西陇海兰新线、南贵昆三角区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各省市自治区也作了重点开发区域的规划。现在看来，一带、一线、一区的规划显然太大了。2004 年国家发改委提出把成渝经济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四川提出重点开发成都经济区，成（都）德（阳）绵（阳）经济带，广西提出重点发展南（宁）北（海）钦（州）防（城）经济区，陕西提出重点发展关中平原经济区，等。如果真正这样做了，西部开发就大有希望。